

別宥齋藏書目錄



(上)
· 經史子集 ·

寧波出版社
Ningbo Publishing House



天一閣博物館 © 編

别宥斋藏书目录(上)

天一阁博物馆 编



宁波出版社
Ningbo Publishing House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别宥斋藏书目录/天一阁博物馆编.—宁波:宁波出版社,2008.8

ISBN 978-7-80743-275-3

I. 别... II. 天... III. 私人藏书-图书馆目录-宁波市
IV. Z8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16728号

编目组名单

组 长:虞浩旭

副组长:饶国庆

成 员:袁 慧 刘 云 周慧惠

谷 敏 陈斐蓉 袁良植

葛蓓钊 李开升

别宥斋藏书目录

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(宁波市苍水街79号 31500)

责任编辑 倪建飞

印 刷 浙江开源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9×1194毫米 1/32

字 数 740千

印 张 37

版次印次 2008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743-275-3

定 价 60.00元



序

时维盛夏,岁在戊子,天一阁博物馆典藏研究部编撰的《别宥斋藏书目录》即将面世,这是文化界、学术界和藏书界一件意义深远的事,也是许多研究浙东学术、天一阁发展史、宁波藏书家及其藏书的读者所期望的。

别宥斋又名香句室,是浙东卓有成就的藏书家、版本目录学家、文物收藏家、鉴赏家及著名律师朱鄮卿先生的藏书楼。然先生的名号,如今知道的人并不多,他的贡献和作用,至今也尚未被人们所充分认识。为此,我想借古籍整理组同志请序于我之机会,对先生的家世、藏书特色、藏书思想、个人遭际以及最后将全部收藏捐赠给天一阁的过程略作论述,以表示对先生的缅怀与敬仰,同时使更多人走近这位知识渊博、目光深远、忧国忧民的前辈,了解他对天一阁所作出的巨大贡献。

—

1968年7月24日,瘦弱不堪的朱鄮卿先生在历经各种政治运动冲击和病痛煎熬后,黯然辞世。弥留之际,他仍念念不忘花毕生精力收藏的图书、文物。琴剑飘零,物是人非,他怀着无可奈何、又对日后寄以希望的复杂心情,对前来探望他的挚友沈曼卿先生嘱托:“查抄的藏书藏品,日后倘能璧还,还是捐赠天一阁为好,俾使永久保存。”并对其亲属说:“予以善本遗之某,某决不能读,则有若无也。予下世后,某或货于人,未必得善价;即得善价

矣,仅仅多挥霍数日耳。”又说:“吾旦暮人也,终当谢也。身后尔曹当为我善处此书,其为我捐赠天一阁,并存不朽,吾愿足矣!”他去世后,其家属遵照先生遗愿,于1979年8月17日将别宥斋藏书10万余卷,又字画900余幅,器物800余件捐赠给天一阁。(姚重之《朱氏别宥斋献书启》,载于1979年9月12日《浙江日报》)

朱鼎煦(1885—1968),字赞父、酇卿(或曰赞卿、耆卿、宰卿),号别宥、香句等。清光绪十一年二月十日(1885年3月26日)出生于萧山朱家坛,后迁居萧山城內金家桥。

他出身于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家庭。父嗣奇,字穉谷,贡生,候选县学训导。乡人将朱老先生称为“穉谷老店王”。母汤氏,“年十七归同县举人朱穉谷”。(《萧山朱家坛朱氏宗谱》)宁绍地区有些地方,习称老板为“店王”,据此推测,穉谷老先生可能在某一时期开过店铺。朱酇卿先生自述,其父亲藏书比较芜杂,没有什么善本,藏书的使用价值与版本价值均不高,别宥斋藏书主要靠他本人多年努力才创建和积累起来的。

先生六岁入私塾。当时清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。清光绪三十一年(1905),迫于时势,清政府决定废除科举,兴办学校,从科举通向仕宦的道路从此戛然中止。酇卿只得重新就读于新式学校,先后进入萧山高等小学堂、绍兴大通师范学堂、杭州宗文中学就读。清宣统元年(1909),考入浙江省法政专门学校,刻苦攻读三年,以优异成绩毕业,并获赠“副贡”(此时“副贡”已纯属荣誉性虚衔,成为一种奖励),授八品录事。此时先生已二十七岁。

民国元年(1912),先生出任鄞县法院推事(当时法官称“推事”),未满一年即辞职。据沙孟海先生撰《朱君生圻志》述:“既解鄞事,鄞范君贤方(1877—1917,字仰乔,同盟会早期会员,宁波辛亥光复领导者之一,曾任宁波军政分

府执法部长,浙江高等法院院长,后又被孙中山先生任命为广州军政府国法院院长)辟君为东莞初级审判厅长;崇德凌君士钧(1883—1945,字砺深,号狷叟,浙江崇德人,迁杭州,曾任浙江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校长)辟君湖南高等审判厅推事;嘉兴褚君辅成(1873—1948,字慧僧,嘉兴人,同盟会早期会员,曾任浙江省民政厅长,民初国会众议员,上海法学院院长。1945年7月,与傅斯年、左舜生、黄炎培、章伯钧等五人共访延安。1945年9月,他与许德珩等共同发起创立九三学社)辟君司法科秘书,悉辞未赴。”

辞职不久,先生改任绍兴龙山法政专门学校(1913年该校并入杭州法政专门学校)教员,担任辩护士(相当于执业律师)。1914年,正式改业律师,在鄞县地方法院辖区内执行职务。

从事律师这个自由职业,先生自有其抱负:“以为辩护之职,务申民隐,扬直抑顽,有益人群。是亦为政而不牵于位,故得游心艺文”(《朱君生圻志》,天一阁藏)云云。也就是说,做一位公正的律师,可以保障人权,申张正义,抵制邪恶,干有益于民众的事。正因为律师是自由职业,先生还可以腾出适当时间和精力,从事自己热爱的事——藏书和研究著述。

1916至1927年间,先生曾任鄞县律师学会副会长、会长,代表法团参与浙江省宪法会议,出席国际律师协会,代表法公会参加八团体国是会议,任宁波市政筹备处筹备委员兼文书股主任,担任省政务委员会秘书,审查全市司法人员。1932至1936年先生任鄞县文献委员会委员及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委员。1941年4月,宁波沦陷,先生“避居山中”,辗转将古籍、字画等寄藏于白象桥郭家以及后隆(或称“后弄”)、牛背脊、阳庵堂等地。乡间的保存条件很简陋,“巨柜累累,转徙流离,盗贼垂涎,向其劫掠,伤及手臂。不得已,由西郊入城,赁居云石街,白蚁蚕食之。”

(《朱君生圻志》)这就是鄮卿先生所称的遭“水火盗虫”四厄。他本人则转徙宁波南门通利源榨油厂暂寓,以躲避日寇之纠缠。当时该厂厂长戴仁烺君,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,日本侵略军当局企图拉拢他,一直对他礼遇有加。朱先生亦因此而将之暂作避风港。朱氏藏书于1943年迁回城南,其间遭“水家之役,集仕港之役,残失之数统计未由。”(朱鄮卿《金莲记跋》)1945年,抗日战争胜利,先生重操律师旧业,直到1949年5月宁波解放。

朱鄮卿先生从事律师工作近四十年,绝大部分时间在宁波。先生学兼中西、博识多才,他国学根底深厚,进法政专科学校以后,又汲取了西方的民主思想与法治观念,接触了西方法制史,诸如《英美法》、《罗马法》等;民国年间,学习掌握并实际运用《民法》、《民诉》、《刑法》、《刑诉》、《婚姻》、《继承》“六法”,得心应手,又研习《国际公法》、《国际私法》、《海洋法》、《海商法》等等,学问渊博,业务精益求精。加之在辩护时,能处处依法保障当事人的合法利益,因此,声誉鹊起,成为甬上一位名律师。其事务所位于府侧街东段,即今宁波军分区址内,自建有中西合璧的小洋楼,双层六楹,幽静别致,仍以别宥斋名其书室(当时别宥斋藏书,分别度藏于鄞县和萧山两地,而以鄞地为主)。民国《鄞县通志·文献志·艺文》称:“宁波府侧街寓庐六楹,插架森森,皆典籍也。”冯贞群先生撰《别宥斋藏书记》对其周围环境的描述称:“鄞城(中山)公园之左,前后屋二列,列三楹,所谓别宥斋者是也。前圃杂蒔花卉,斋中陈设书法、名画、佛像、砖甃,外蓄警犬、笼鸟,嗥嗥啾啾。书友(主要是书贾)挟册来,与之论值,而室人交谪,与其声相和也。”反映了当年鄞地别宥斋的盛况。可惜别宥斋已被拆除,徒留遗址,供后人凭吊。

萧山别宥斋藏书价值亦不菲,其中珍版善本不少,以明代方志、清初禁书及乡先哲未刻遗著最为珍贵。万分惋

惜的是,这些凝聚着酈卿先生半生心血的典籍,在日寇入侵时竟全部遭毁。据先生《香句室忆语》(稿本一册,现藏于天一阁)一文回忆,萧山别宥斋藏书室“与车站密迩。芦沟衅起,飞丸弹火,日日旋绕其旁,乃移度于绍兴之下沥桥,历两年余。”原以为下沥桥“林嶂秀阻,人迹罕交”,可保无虞,却未料日寇于1940年2月17日“扫荡”下沥,玉石俱焚,藏书悉数毁于战火。因来不及编目,缺乏详细记载,估计罹劫图书有十万卷左右,其中包括历年来收购的王氏十万卷楼和陈氏湖海楼旧藏。

购入湖海楼的书是在民国十六七年间,先生在《香句室忆语》中写道:“丁卯、戊辰间,邑中湖海楼旧藏待价而沽,予贷款于钱肆,兼程并进。”购入后,先生即编撰《香句书录》(此稿本现藏于天一阁)一册,著录图书约数百卷。数年后,萧山别宥斋旧藏罹难,先生在《香句书录》扉页追记云:“是书所录皆初收陈氏湖海楼书,先训导卧疴归里侍疾,天暑阖户聊以遣忧。乃不数年,日军侵华,悉付之一炬。”

这批萧山别宥斋珍藏图书被毁,酈卿先生悲愤交加,乃先后作《香句室忆语》与《别宥斋萧山藏书精华之一斑》(稿本一册,附书目,现藏于天一阁)。文中有“恍见累累书城,随烈焰以俱去”等痛心疾首之语,并在书目中追记善本三百余种,其中有《大明会典》、万历《湖广总志》及《山西志》等湖海楼旧藏一百五十种。此外,在《香句室忆语》中还提到“嘉靖《山东志》、《吴邑志》,康熙《江南志》,并云南、贵州、四川、台湾等十四省志,皆潢川吴氏旧藏。”甬上藏书,经先生煞费苦心搬迁隐藏,绝大部分赖以保全。

抗战胜利后,冯贞群编《别宥斋善本书目》,“凡得宋元明槧、禁书稿草、名人手抄校本三百四十六种,入编《鄞县通志》”。(冯贞群《别宥斋藏书记》)宁波解放后不久,别宥斋藏书于府侧街律师事务所,迁移到孝闻街179号。

鄮卿先生曾于1951年11月赴杭,在女儿家暂栖。次年即赁居城隍山2号民宅独住。1953年5月,被聘为浙江省文史馆馆员。1954年8月返甬,从此定居孝闻街旧宅。旧宅环境清雅,一入围墙门内,右侧有一较大的荷花池,池中挖出土方垒成小山一座,植树蒔花,四时芬芳,每值中秋,桂香四溢。小山之北,有一青石小径贯通书楼,书楼为二间一弄的两层西式楼房。楼房左旁有数间平屋,因室内住家属,故显得十分拥挤。“屋小如舟,书多如鲫,或笥已中空,或篋外置架,不得已择易于从事者,陆续捡取普通本(如《经解》及浙局《九通》并虫蛀水渍残缺者)则论斤,善本则论册,先后斥卖。”(朱鄮卿题签,附于《别宥斋善本书目》)不久,宁波市人民政府聘请先生担任宁波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。20世纪50年代末,曾任民革宁波市(第六届)委员会委员及宁波市政协委员。朱鄮卿先生一生为人耿直,热爱祖国,敢于建言献策,勇于针砭时弊,特别是对宁波地方文物保护和文献整理工作,多有贡献和建议。

先生交游广泛,既有学界鸿儒,亦有商人书贾。他与方志学家马瀛(涯民)先生,教育家杨贻诚(菊庭)先生,藏书家兼版本目录学家冯贞群(孟颀)先生,书法名家沙文若(孟海)先生,学者兼实业家沈曼卿先生等堪称莫逆之交。在北京,他与郑振铎、马衡、赵万里等著名学者均有较密切的交往。1932年夏,郑振铎、赵万里欲登天一阁观书,以范氏约,非曝书日即子孙亦不得登阁,“于是我辈乃谋访鄞地各藏书家,尽数日之力,于冯孟颀、朱鄮卿、孙翔熊诸氏所藏,皆得睹其英焉。”(郑振铎《西谛书话·录鬼簿》)他与宁波米业同业公会主席袁南山先生很熟,朱氏在《日记》中多次提到,南山先生在北大路开有米店,先生常去南山处谈心,向他探询气候情况,便于自己的书籍字画保存。因为做粮食生意的人,非常关心气象变化,收购与运

输,以及年成好坏,都与气候有关。先生与公园路上骨董古玩店里的店主与伙计来往也很频繁,常与他们一起欣赏古玩,切磋鉴定心得。先生还颇通医道,自学中医诊断,根据他的《日记》记载,多次给邻里把脉、看病、开处方,而且效果很不错。

酆卿先生在1954年的《日记》中记载,其家庭成员有:“配来氏、魏氏,侧室许氏。子男一,大俞,许氏出;女一,适吴兴陈宗文,来氏出。孙男四:弘宣、弘得、弘正、弘世。”朱先生的夫人和唯一的儿子大俞都先他而逝,他晚年的生活,多亏儿媳姚重之照顾。1979年9月1日捐献存书之举,也是由姚重之为代表来完成的。在隆重召开的捐书和颁奖仪式上,朱氏家属代表郑重宣读了《献书启》,从此,这份珍贵的祖国文化遗产得到永久妥善保存。先生有一胞妹,适萧山王氏(十万卷楼王氏后人),一直居住在上海儿子家中,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谢世。

酆卿先生自撰的《朱君生圻志》称:“朱氏世出婺源,十五世元季自江右来徙。曾祖辂。祖铭,父嗣奇,清岁贡生,候选训导,母汤氏。”其世系大略如此。

二

酆卿先生从小酷爱读书,并热心协助其父藏书。他在《跋贛榆县志》一文中叙述过:“煦年十一二即喜为先训导曝书。十七(再次)入塾,习场屋文。每于灯下点次《通鉴》,狭行烂字,不易辩识,其卷头纸尾,又少下笔处,一见同学之同文(书局)石印本,眼为之明,是时已萌收书之念。”酆卿先生勤于校勘,精心考证,蝇头细楷的眉批、夹注,书中随处可见;更于卷首尾作序跋,详言注释之出典,以及与各家见解异同之比较,因此每有鞭辟入里的创见。对此,我馆编目组同志在整理著录其藏书时均赞叹不已,深为先生深厚的学识功底和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所折服。嘉

靖《象山县志》2300余字一丝不苟的小楷题跋,即是一例。

从事律师职业以后,由于精通律法,又具有高度敬业精神,先生声誉日隆,找他代理诉讼的当事人日益增多,因而收入渐丰;复以爱护祖国典籍文物胜过爱惜自己的生命,有一份强烈的保护祖国文化的责任心,全家人又节俭成习,这就为扩大古籍及字画、文物收购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。从20世纪的20年代至50年代的30年左右时间里,是他充实别宥斋藏书藏品的黄金时期。

他对藏书藏品的流传源绪(包括藏书讯息)极为关心并了如指掌,凡遇故家藏书藏品散出,必千方百计,不计代价,志在必得。民国《鄞县志》记载:“常熟毛氏汲古阁,歙鲍氏知不足斋,余姚卢氏(文弼)抱经堂,萧山王氏十万卷楼、陈氏湖海楼,山阴沈氏鸣野山房,鄞范氏天一阁、卢氏(址)抱经楼,慈溪叶氏退一居,诸家流散,如水赴壑,集于朱氏。复往来杭州、上海间,购所未备。”由是藏书最多时达数十万卷。后虽经“四厄”,至捐赠给国家时,仍有十余万卷之数。

先生搜求古籍,多数通过书商购得。他有《购书日记》稿三册,对1932年12月至1937年7月,按日期将书籍来源、作者姓名、卷册数量、版本优劣、收购价格、中介书贾均一一详细记录,是研究别宥斋藏书十分珍贵的史料。例如:“民国二十三年九月一日,陶贾浩安世德堂购《明文海》稿本六册,真迹至,堪宝爱,三元。”

这五年中,收购的各类古籍,主要渠道来自甬地书商,被他记录在册的,除经常可见的陶贾世德堂外,尚有林贾云宝(芸葆),周贾馨才,林贾集虚(字乔良,藏书室及书店均名大酉山房),王贾养清,董贾良君,及林阿富开明书店、朱安定通雅书局。同时又借赴杭办案之机,常去小琳琅馆、经训堂、复初斋、石渠阁、文艺书局、汇经斋、抱经堂、拜经楼、民治书局、宋经楼、彗华堂、善本书店等处淘

书。此外,在其他各地买过书的,还有绍兴取斯堂、宝贤堂、景仁堂,苏州来青阁、大华书店,上海来青阁、商务印书馆,北京琉璃厂来薰阁、中国书店,萧山两宜斋书坊及书贾周荣昌、陈又新、黄元德、徐得宝等,真是“凡足迹所至,闻见所及,遇有善本,奢荡营谋以得之”。千万不可小觑这些书贾,他们都是版本目录和古籍经营的行家里手,富有鉴别眼光,懂得书海行情,鄮卿先生能联系这么一大批书商,可见其收购渠道与信息网络之广阔。在文物、古董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况。先生平时也喜欢跑古玩铺,距他府侧街宅邸仅咫尺之遥,有一条公园路,昔时多古玩铺,是先生经常光临之地。鄮卿先生平时治家俭约,日常几角几分的支出亦记细账,但一遇佳本,就当机立断,不惜重金予以收购。《鄞县通志·文献志·艺文》记载:“(鄮卿)尝邂逅得宋本《五代史记》,把玩考校,喜而不寐。书友示以顾千里(广圻)手校《仪礼》,典衣买之,故人笑为书痴。”他的藏书来源,除了长年累月坚持淘书以及通过书商收购以外,还有一个来路是“知旧相赠”。虽然这不是主要渠道,但亦偶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如存世极少、版画精美的明万历间陈氏函三馆刻本《金莲记》(谱东坡事),就是师长姚莹俊相赠。《金莲记跋》云:“余之略知版本,姚先生启之也。一日出此书相赠,却之不可。曰:‘后人不知宝惜,今归子,得所矣!’余报以狐裘一袭。”

先生又是一位性情中人,爱憎分明,敢怒敢言。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,文化行政部门对藏书家的藏书进行登记,并派遣干部至某些年迈的藏书家处“协助”此项工作。这时朱先生在《日记》中记着:“大家都是共和国的公民,为什么康生的藏书不需要登记,而我们必须登记?”从法理上讲,这确是一种不公平的现象。又如他碰到一些水平不高又自以为是的干部,对藏书和文物的来历与价值说长道短,他就将之比喻为“牛吃桂花,不知滋味”。而对平

时辛辛苦苦、默默无闻埋头工作的老黄牛式的干部或职员,每当中秋丹桂飘香之时,先生就会亲自送上从自家庭院剪下的桂花数枝,表示慰问和敬意。

鄮卿先生的藏书,往往是蹊径独辟,慧眼独具。不像某些比较正统的藏书家,收藏范围不出四部,尤重经部,次则史籍、文集。而先生则广罗博收,举凡名著稿本、读书札记、方志、医卫、历算、戏曲、宗教、民俗、音韵、字书、种草蒔花等等,多有所涉,亮点时见。如嘉靖刻本《重校正唐文粹》,为最早之唐诗文选本,对后世选家有较大的影响;明万历间绘图精刻的《金莲记》、《牡丹亭还魂记》,明季刻本《燕子笺》是戏剧传奇;明正德刻本《姑苏志》、嘉靖刻本《象山县志》等一批方志,均是海内孤本或罕见之本;明弘治刻本《容斋随笔》则是学术笔记内容的散文;明嘉靖刻本《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》、明万历间金陵刻本《茹草编》、日本享保二十一年刻本《普济本事方》及《续集》等都是有相当医学医药价值的著作;清光绪刻本《太医局诸科程文》,系宋代考医试题问答记录;明刻本《天台山方外志》、明嘉靖刻本《张洞玄玉髓真经》前后集、明建阳刻本《冲虚至德真经》等为释道宗教之作;明天启元年茅元仪刻本《武备志》为一部影响深远的综合性兵书;明《大统历》系天文历书;姚燮《西沪棹歌》稿本是反映时局的民俗民歌作品;明末黄宗炎批校的鸣野山房抄本《祁承燾澹生堂书目》等为书目类工具书;洪适《隶续》、陈鼎稿本《竹谱》、吴菴《卉记》、沈复槩《庚子书画记》等,为书画作品技法及评论之作;清初“二老阁”精抄本《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》、明嘉靖刊朱色初印本《金石韵府》、明万历顾氏芸阁刻朱墨印本《集古印谱》、明刻本《啸堂集古录》等,乃研究文物遗存的参考书;明末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《集韵》,为研究音韵小学的经典著作;明刻大字本《重刊许氏说文解字五音韵》为一部古代文字学大典;明刻四色套印本

《南华经》、明凌濛初刻三色套印本《世说新语》等,是明套印本中有较高的艺术价值的稀有品种;明蓝丝栏抄本《三才广志》为我国古代流传下来仅存的一部最大的私纂类书;清初刻本《离骚图经》、《离骚辨》,具有楚辞研究与美术欣赏的双重价值;清释普荷绘图稿本《七十三壶图》,为研究我国古代陶艺之珍贵史料……

鄮卿先生藏书中,特别重视史学著作和乡邦文献的收藏和研究,这应该与浙东学术风气有关。这方面藏书更是珍品迭见。如宋刻元补本《五代史记》,是书为唐以后唯一的一部私修正史,是研究五代十国历史的重要材料;元至正刻本《鄂国金陀续编》,乃现存最详尽记录岳飞事迹的重要史籍,由岳飞之孙岳珂编;元建阳坊刻本《书经》,所载时代“上断于尧,下断于秦”,内容涉及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地理、人事、灾祥等,是一部研究上古史的重要文献;元刻明嘉靖修补版本《三国志》,首有己巳八月(1929)钱罕亲笔题跋;明乌丝栏抄本《鄮峰真隐漫录》,所言皆治家修身之道,保存了南宋中兴时期政况的第一手资料;《明文海》、《明文案》,是黄宗羲辑集的明代作者的诗文集,这些传记为研究明代正史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;元刻本《金史》、明天一阁刻本《司马温公稽古录》、清卢文弨手校精抄本《国史经籍志》、《金陀粹编》正续编、万斯同等稿本《明史列传》等,都是学术价值和版本价值很高的史籍。

1936年举办浙江文献展览会,别宥斋应征展送乡邦文献有:余姚黄宗羲辑《明文案》,鄞县万斯同《明史稿》,会稽李慈铭《越中先贤祠目次》,象山倪象占《九山类稿》、镇海张成渠《连珠均考》,镇海姚燮《西沪棹歌》及《书癡楼诗稿》共七种。其中万斯同的《明史稿》存十二册,引起了著名学者柳诒徵等人的重视与研究,鄮卿先生也撰有书跋云:“1934年,周氏携至金陵,谓河南革命遗族亟需抚恤,其值高悬,无人问鼎。沙村书来,称楚弓楚得,当归甬

上。余非鄞人，走告伏跼、蜗寄，则皆固拒。函电交驰，不绝于道，属有天幸，归于余篋。与黄梨洲《明文案》稿本为侣，同为句章双璧。”因所得《明史稿》在前，《明文案》在后，故刻“万黄斋”印章，钐于此书各册之末，以志胜缘。

先生藏书印有：“朱家”（白长方、白方），“朱鼎煦”（朱方、朱长方、白方、白长方），“鼎煦”（朱方、白方、朱圆、白椭圆），“煦”（朱方），“酈卿”（白方、白长方），“鼎煦小印”（白方），“朱鼎煦印”（朱方、白方），“律师朱鼎煦印”（白方），“律师朱鼎煦校对之章”（白方），“别宥”（朱方、白方），“别宥斋”（朱方、朱长方、白方），“萧山朱别宥”（朱方），“萧山朱氏”（朱长方），“萧山朱别宥室藏书”（朱圆方），“萧山朱别宥斋藏书印”（朱方），“萧山朱氏收藏图书”（朱长方），“萧山朱鼎煦收藏图书”（朱长方），“萧山朱鼎煦收藏书籍”（朱长、白长方），“萧山朱家坛太平桥人”（白方），“朱别宥校”（朱长方），“朱别宥收藏记”（朱长方），“曾在朱别宥处”（朱长方），“别宥手拓”（朱方），“别宥所拓”（白方），“别宥经眼”（朱方），“别宥过眼”（白方），“酈卿过眼”（白方），“熙修阁”（朱方印、朱长印），“香句室”（朱长印），“香句偶得”（朱方），“香句赏心”（朱方），“治书轩”（朱方印、朱长印），“久视轩”（白方），“卧云堂”（朱方），“万黄斋印”（朱方），“乐寿堂”朱方，“秘本”（朱椭圆），“甲”（朱方），“伯雅”（朱方）等。

酈卿先生晚年时仍抄书著书不辍。他在 79 岁时，尚借抄杨氏清防阁藏阮大铖《和箫集》一书，有跋文云：“书主杨容士，廿年老友，以百元现金作押，限日归还，乃谆谆以从缓为词。及再三商借，云与曼卿言之当有眉目。即谒曼卿，曼卿出此书曰：‘容士云，汝我皆年老，约曼卿为证人。’余携归，始手摹。”可为书林趣事。除藏书外，先生还自费出版过冯君木（冯开，字君木，1873—1931，著名国学家，与陈训正、应启墀、洪佛矢称“慈溪四才子”）《回风堂

诗集》，计 200 部，每部 2 册，由沙孟海题写书笺。分赠全国 40 个大型图书馆及君木先生生前好友。先生曾长期从事我国藏书史研究，收集有关参考书百余种，着手编《藏书家名称印鉴大辞典》，书成及半，于 1958 年 1 月请马涯民先生作序，自以为“年逾七十，精力尚强”，可以完成这部数十万字的著作。可是到了那个“史无前例”的年代，先生已届耄耋之年，同样难逃厄运。别宥斋藏书被查抄，这部书稿亦散佚无存。1966 年“文革”刚开始，先生即被无休止地批斗，戴高帽游街示众，从事街道保洁工作。至于他的藏书，幸亏当地文化部门自行组织“红卫兵”，借“破四旧”之名，抢先一步把别宥斋藏书和文物藏品“封存”（实质上是保护）起来，侥幸躲过一劫。

藏书家的藏书目的不尽相同：有的为了“良书播惠九州”，泽及后人，把藏书定为家族共有，“代不分书，书不出门”，虽有严格要求，但对学人却倍加关怀，尽量提供方便，此可谓有选择对待借阅使用者，如范钦、大冲父子；有的近乎“为藏而藏”，藏之不露，秘不示人，把藏书视为财富，因此被人讥为“书奴”，话虽刻薄，并非全无道理；有的为学而藏，为学术研究积累和存储资料，如谢山双韭山房藏书；亦有为纪念特定人物而收藏的，如郑性的“二老阁”；还有一种是边经营边藏书，收到好书即入藏，待善价而沽，林集虚大酉山房即是。别宥斋藏书，则应归入学者型藏书家一类。

三

宁波的藏书文化，除了“名楼迭出，私家为主”外，尚有许多优秀传统和可贵的人文主义精神。在宁波藏书文化史上，不论是闻名遐迩的藏书家和藏书楼，还是那些默默无闻的小藏书家，他们对于保存祖国典籍文化与传承精神文明，促进社会进步与和谐，都作出了潜移默化的贡

献。

民国期间，先生曾任鄞县文献委员会委员及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委员。1933年9月18日，宁波遭强风暴，天一阁宝书楼东墙一角倾颓。鉴于范氏无力自修，同年10月1日，鄞县文献委员会开会，发议由公家筹款兴修。经过筹备，于10月24日成立重修天一阁委员会，先生为委员之一，从献计献策到具体参与，先生均尽心尽力，不辞辛苦。1933年夏，赵万里征得各方同意，登天一阁整书，鄮卿曾加襄助，“孟颢、隅卿二位先生，和大律师朱鄮卿先生……都来帮忙。”（赵万里《重整天一阁藏书记略》）先生谢世后的第11个年头，即粉碎“四人帮”后第二年——1979年8月17日，其家属遵照先生遗愿，将别宥斋藏书、字画及文物全部捐赠给天一阁，受到宁波市文化局的表彰和奖励。

被称为中国藏书楼典范的宁波范氏天一阁藏书得有今日规模，乃是百川归海，宁波藏书家的共同奉献。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，当地许多藏书家，张侗、徐馥藻、张季言、冯贞群、朱鄮卿、孙家淮、杨容林、袁眉堂、张孟契等，纷纷把藏书（包括碑帖、字画、器物）捐赠给天一阁。这些藏书家捐赠古籍，总量达105400余册，其中有51000册为别宥斋捐赠之书，占有所有捐赠古籍48%之多。若以天一阁目前藏书总量150216册计，朱氏赠书则占34%之多。此外，别宥斋还有珍贵的字画和器物，如宋黄庭坚草书《刘梦得竹枝词卷》、明范钦《诗翰长卷》、元代四大画家之一的吴镇《双树坡石图》、明万历时的雕填龙纹漆盒、清乾隆时的琥珀炉等，均属国家级文物。由于这许多藏书家的无私捐赠，使天一阁原藏、新增之书交相辉映，知名度愈来愈高，图书馆界和文献学界，以及广大的学术研究工作者，均视天一阁为“书城钜观”、“文献圣地”，到天一阁来参观访问，抱着一种虔诚仰慕的心理。1996年“天一阁及中国藏书研讨会”、2003年“中国藏书文化学术研讨会”以